



公共艺术，植入城市的文化记忆

Public art, Cultural memory around the city

杨杨 Yang Yang

工业化的进程后，城市变得日益巨大，人口增多，功能分区繁杂，物质的丰富引发了人们对于生存环境改善的要求。而城市繁杂的体系、冷漠的工业空间更加剧了相关的问题。由此，在20世纪初，有不少的建筑家提出了他们的城市规划理念，如柯布西耶的“现代城市”，赖特的“广亩城市”，欧文的“花园城市”概念。这些都是在应对飞速发展的城市容量的命题下，提出的城市合理规划方案，然其规划是以快速运行的高效为前提。现代简约风格的建筑去掉了原本作为建筑整体一部分的艺术与装饰，使得城市空间变得单向而冷漠，由此，对于人性多重需求的探讨，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建构中开始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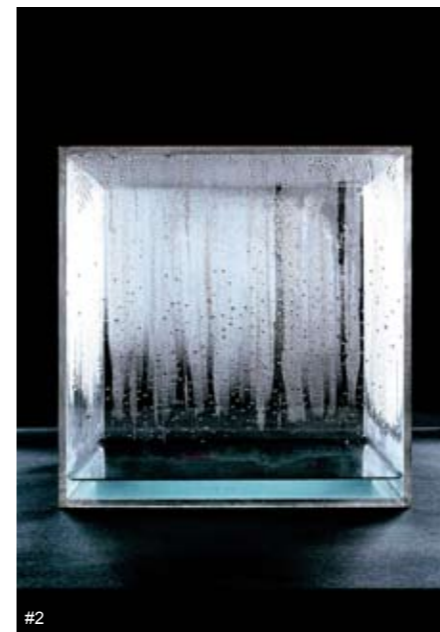
公共艺术概念的形成以及较大规模地在城市中得以实施，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就曾组建“公共设施的艺术项目”，组织并调动全国的艺术家的，如考尔德(Cakler)、里奇(Richey)、史密斯(Smith)和一些现代主义画家如米罗(Miro)、毕加索

(Picasso)等参与其中。为各大城市的公共建筑以及公共设施进行艺术性的美化与装饰。据统计大约有5300个艺术家受雇参与各大城市的街道、广场、火车站等公共场所绘制壁画与雕塑的创作。从1933年到1943年间在美国各大城市共创壁画约2500余幅、雕塑约18000件。

1959年费率率先批准了1%的建筑经费用于艺术的条例，以立法的方式制定百分比艺术条例来推行公共艺术融于城市建设的发展。条例规定扩展到办公室、桥梁和广场等公共设施，艺术的类别包括雕塑、彩色玻璃、喷泉和壁画等。1965年为了高水平地保证这项工作很好地实施，美国成立了国家艺术基金会直接资助本国的公共艺术事业。60年代后期，美国总服务处的建筑艺术计划(Art in Architecture)也开始实施，为美国战后公共艺术的复兴做出了贡献。由此，大批著名艺术家的公共艺术作品出现在美国许多大小城市中，有些艺术作品甚至成为该城市的标志与精神象征，彰显着城市的魅力并成为这座城市人民智慧的见证。随后，美国许

公共艺术对城市公共空间介入的另一个重要源头来自20世纪20至50年代的墨西哥壁画运动。20世纪20年代初，一批从欧洲学习后返回本土的艺术家和社会精英，把从欧洲学到的古典艺术以及先锋派等现代艺术成果与墨西哥本土印第安文化艺术相融合，在城市公共建筑的墙面上创造了大量的气势磅礴的壁画。

1. 左轮手枪
曼尼菲斯特 (Mani Fiestors) 2014
2. 汉斯·哈克作品
3. 托尼·史密斯作品



多城市都接受和采纳百分比法案，通过公共艺术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介入，利用多样化、激励性的文化环境提升市民和旅游者的生活质量。百分比艺术政策极大地改善了城市的空间环境，它在提升市民的文化修养和城市文化底蕴的同时，也给国家和城市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公共艺术对城市公共空间介入的另一个重要源头来自20世纪20至50年代的墨西哥壁画运动。20世纪20年代初，一批从欧洲学习后返回本土的艺术家和社会精英，把从欧洲学到的古典艺术以及先锋派等现代艺术成果与墨西哥本土印第安文化艺术相融合，在城市公共建筑的墙面上创造了大量的气势磅礴的壁画。这些壁画以其独特的象征、浪漫及表现主义的手法，深刻地表现了墨西哥民族文化历史的沧桑与变迁，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墨西哥的文化价值取向与观念，开启了城市记忆的公共化进程。

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以城市环境建设与改造为契机，以公众审议的方式设立一年一度的公共艺术新作开幕典礼，让市民关注并参与公共艺术建设，并在作品竞选中逐渐形成相应的民主机制和审议程序。

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改变，现代艺术的手法也跟之前发生了很大的不同，从原本静态的艺术形式扩展到更具交互性的互动形式，

艺术不再注重一种纯粹的欣赏，而是希望调动一切因素，去影响观者的感受。艺术也开始从固定的形式如雕塑、绘画、壁画中逃离，现代语境的丰富文本，给艺术带来了新的脚本和佐料，大大扩展了艺术的形式和方法，由此，观念艺术、新媒体艺术、行为艺术、激浪艺术等都活跃在我们的视野。艺术不再是一种传统的个人语言体系的修持，而是具有更广泛实践意义的一项行为，更强调艺术的功能性及行为扩展。

在这样的境况下，城市公共艺术扩展了原本的美化城市空间的简单功能和相对单一的静态形式，进入一种更多层次的扩展。如法国的阿拉贡纪念章城市公共艺术项目。阿拉贡(Francois Arago)是法国19世纪早期知名的天文学家、科学家、也是政治人物。巴黎原来有一座纪念阿拉贡的雕像，但在1942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熔化用于军事用途。荷兰艺术家狄贝茨(Jan Dibbets)采用了反传统的雕塑方案来重塑对阿拉贡的纪念。艺术家没有采用传统的设立于高台上的纪念性圆雕的方式，而是在巴黎城市内沿南北子午线，在地面上放置了135个直径12厘米的铜质纪念章，纪念章上铸有阿拉贡的名字和南北方向的标志。艺术家的创作既避免了重复旧式的纪念性雕塑，也通过和子午线的联系，强化了阿拉贡和他的历史贡献之



间的关系。这就完成了一个用看不见的子午线造就的想象之纪念碑。法国公共艺术理论家卡特琳·古特(Catherine Grout)这样评论它：“每看到一个纪念章，我们的想象力就受到刺激，因为总是像第一次看到一样，行走时我们会发现这小小以浮雕方式写着ARAGO的纪念章，并且有两个字母N（代表北方）及S（代表南方）。这点将我们放在多重的关系位置上，将我们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与一条移动的线之上。”

而日本立川市的城市项目则显得更为具有整体性和人文规训的能力。立川市位于东京都多摩区境内，属东京众多大型卫星城市之一。1922年日本军国主义在此设立了陆军飞行第5连队的军用机场，各种商业、工业也随之发展，1945年日本战败后立川机场由美军接管为空军基地。在90年代立川市提出“Faret Tachikawa”公共艺术计划，对整个城市的建筑物包括办公楼、宾馆、大型百货公司、电影院、图书馆等11栋建筑物组成的7个街区进行公共艺术改造，吸引了36个国家、共计92名艺术家共同参与。大到饭店门口的艺术造景，小至水龙头、消防箱、公共座椅、地面铺装、通风口，都经艺术家重新打造。美化有负面形象的公共设施，如垃圾焚化炉；将现有的公共设施，如地面、建筑外立面、排气孔、地下排水井

盖、消防栓、停车标识等有效利用，使他们在实用之余也有艺术价值；利用广告板隐藏混乱的城市内面；美化建筑的各连接点，如入口、楼梯口等；利用公共艺术活化新旧建筑；美化混乱不美观的汽车与自行车停放处。由此，用艺术方式的涉入，不仅美化城市，同时将城市中的人进行了规范，用美的方式规训了人的行为，进一步改变城市的气息及其文化。在之后，在日本还实现了如新宿的“T-LAND”公共艺术计划等。

在现代艺术的影响下公共艺术时常也以其行为表演及概念互动而存在，如博伊斯的《七棵橡树》所带来的公众的参与性及公共意识的影响。而汉斯·哈克为奥地利格拉兹市展会做的名为《而你们曾经是胜利者》的作品，同时也是城市记忆的概念性转化。哈克将格拉兹市的圣母柱用一个更大的方尖碑罩住，并挂上“而你们曾是胜利者”的横幅及纳粹标志。这一行为装置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并在之后的11月2日，方尖碑被一个新纳粹外围组织成员用流弹袭击。这件作品的历史背景是格拉兹市曾被希特勒授予“人民起义之城”的荣誉称号，为了庆祝此举，纳粹分子曾在1938年在圣母柱的基础上做了方尖碑。哈克根据当时的照片，还原了这一建筑并将其改装为一个纳粹受害者纪念碑，标志便是底座上添加的斯蒂里省战败者

1. 亚历山大·考尔德作品
2. 提安娜·图菲(Tatiana Trouvé)作品
- 3-4 托尼·史密斯作品
5. 简·狄贝茨作品



名单，条幅上是“而你们曾是胜利者”的标语。此时昔日荣誉象征的方尖碑成了对纳粹分子最好的讽刺和揶揄，而圣母柱和方尖碑曾经是纳粹政权的标志性建筑这一公共空间固有的政治意义。他的行为，不仅唤起了人们心中的历史记忆，并且由于这种偶然的被袭击而强化了作品的现实意义，并形成了城市记忆的强化和反思。

城市公共艺术作为一个现代艺术的试验场，其影响的广泛性，都成为了艺术家的跃跃欲试实现自身艺术理想的合理试验场，城市空间作为一个有着大量观者的场域，其所带来的背景是丰富的，艺术作品通过丰富的交流来形成自身的作品意象及文化符号。而城市也能通过艺术家所提供的对于生活及未来的理想性追求来反射在作品之中，形成城市文化的良好映照，丰富城市这个冰冷高楼空间的人文情怀。这不同于柯布西耶、赖特等人的效率性城市规划，而是以人文的形式来丰富城市的肌理。

中国在经历了庞大的社会发展后，城市的规模及人口的容量早已使得城市变得巨大。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所丢失的是城市本身的记忆。中国做为一个非常注重历史、注重记录的民族，每个地域所拥有的县志、记录等都清晰的记载了这个城市的历史记忆。然而在现代化城市进程的脚步下，如何延续下

城市的记忆，延续城市记忆中的人文情怀，却是需要我们去不断尝试的。早期中国的城市公共艺术，多以具有意识形态的公共雕塑为主，在城市中心树立起具有纪念意义的雕塑，来纪念并缅怀革命的历史及朴素的情怀。然而到了近代，城市公共区域大型雕塑、壁画及相关视觉符号的统一设计，城市的各种艺术空间、博物馆等相互补充形成了城市的文化脉络。然而这种点状的公共艺术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多层次的城市文化行为。

城市文化的兴建与探索，需要完整的艺术制度，如国外的艺术基金、艺术项目百分比制度、公共艺术选投制度、定期的文化项目等，都可以从很大程度上刺激城市公共文化的投入与建构。在制度之外，如何更好的形成对于公共艺术价值的挖掘，从美化空间、改变居住功能、形成城市记忆等几个方面来强化公共艺术的价值点，形成静态艺术和动态城市发展的协调。由此，民众对于公共艺术的认同感增强，就可形成公共艺术的良性舆论背景，在一层层的铺垫中增加民众对于城市文化、对于生存的思考，来更大程度的拓展城市的文化脉络。

另外对一些艺术行为及艺术活动需给予更高的宽容度。中国做为一个控制舆论的国家，对于艺术行为及艺术集会的容忍度一直很低。然而，话题性的艺术行为毕竟能刺激

人的感知，形成对大众心理界限的挑战和反问，话语权的自由会丰富文化的冲突，形成更为多元的思考，这样人文的建立才会不至于盲目和单向。

城市作为一个载体，是生存与生活、现在与过去的交织，公共艺术作为人文性思考的折射，应更大程度的进入民众的视野，以其自身的互动性、辐射性来形成和民众的交流，以此来植入与城市的脉络中，形成城市的景象、城市的记忆、城市的基因。